

东亚 路在何方



黄范章 谷源洋 主 编
魏燕慎 侯若石 副主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经济路在何方/黄范章,谷源洋主编. -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10

ISBN 7-80105-762-7

I. 东… II. ①黄… ②谷… III. 地区经济-研究-东亚-1997~1998-文集 IV. F1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5547 号

东亚经济路在何方

主 编 黄范章 谷源洋

副 主 编 魏燕慎 侯若石

责任编辑 张贵来 张 正

封面设计 石 洋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市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32 开

8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05-762-7/F·86

定 价 20.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序

对于东亚经济来说,1997年和1998年委实是十分不寻常、不平静的两年。金融风暴袭击了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令世界震惊。

自金融风暴于1997年7月从暹罗湾卷起狂飚,一年多来,东亚金融风暴一直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如果说,在此之前十年间国际社会曾热衷于讨论“东亚奇迹”或“东亚模式”的成就,而今则热衷于讨论东亚金融危机,或讨论金融风暴的成因,或讨论其影响;或总结经验教训,或估量发展前景;有的认为“东亚模式”业已或即将“崩溃”,有的却认为它将“再创辉煌”。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看来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讨论还将进行下去。本书的作者们分别就东亚各国(或地区)为何以及如何被卷入这场金融风暴的漩涡,进行了分析;对各国(或地区)应对之策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对东亚经济的特征及前景有进一步探讨。希望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东亚经济的研究。

这次东亚金融风暴之所以酿成,既有各自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的因素(如对冲基金之冲击等)。有关国家自会从各自的国情出发,就对内对外政策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就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实践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健,在开放金融市场方面尤须如此。

所谓态度积极,就是:明确对外开放乃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趋势的要求而采取的一项基本国策,目的在于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就中国情况讲,在不同地区(沿海和内地)、不同部门(实

东亚经济路在何方

和服务业)由于各种条件成熟的程度和进度不同,对外开放的进程会有所不同,但执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都是坚定不移的。有些部门和地区(不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即使目前尚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也应积极创造条件去促进对外开放。

所谓步子稳健,就是:对外开放要有步骤、有准备、有序地进行。一般说,先贸易后投资,先实业后服务业。前一段为后一段做准备,后一段是前一段发展的要求。金融市场的开放,资本项目的开放,尤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仅需要有基本健康的金融体系,而且需要有比较完备的法规体系,包括规范的运行规则和监管机制。这次金融风暴表明,在本国银行的不良债权过多、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外来短期资金过多、金融资产运行、监管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贸然搞“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开放,容易招致金融风险,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可乘之机。

我认为,在对外开放事业中采取上述积极而稳健的方针,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十分必需的。因为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关市场经济特别是有关金融市场的各种制度、机制及法规都很不成熟或很不完善,如果急于求成,搞“不成熟”的开放,就容易招致“风险”,反倒使开放的进程受到干扰甚至挫折。审慎从事,决不是畏缩,也不是等待,而是要在发展经济、培育市场体系等方面,为推进对外开放创造条件上下功夫。

我还认为,积极而稳健地推进对外开放,是一种极其负责的态度,不仅对本国而且对国际社会都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只有积极稳健,才能推动对外开放平稳、顺利地进行,有助于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就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就是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金融风暴虽然使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但痛定思痛,找出本身的弱点,优化经济结构、完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定能将坏事变好事。事实

上,有的遭到金融风暴袭击的国家(如泰国和韩国)已开始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有的国际组织预测东亚经济将在2年左右内恢复。届时,东亚经济在已有较好的基础上,经过风暴磨炼,必定会获得更平稳、更健康的发展。我对东亚经济的发展既寄予希望,也充满信心。

陈锦华
一九九九年一月

目 录

序	陈锦华(1)
---------	--------

第一篇:专题篇

从东亚金融危机看东亚经济模式	黄范章(1)
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东亚金融危机	侯若石(23)
东亚与欧洲经贸关系	魏燕慎(48)
美国与东亚的经贸关系	黄范章、张磊(62)
中国与东亚经贸关系	石明礼(81)
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周世俭(101)

第二篇:国别(地区)篇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世界经济	谷源洋(108)
“软着陆”后的中国经济走势	汪海波(12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香港经济	夏汛鸽(134)
孤岛的金融防卫战 ——台湾经济	殷存毅(146)
金融动荡中的日本经济 ——1997、1998年的日本经济形势	冯昭奎(157)

韩国金融危机

——“大的并不一定是好的”…………… 徐 忠(170)

受伤的小虎

——泰国经济…………… 韩 锋(180)

又一只受伤的小虎

——马来西亚经济…………… 马燕冰(189)

金融风暴中的一棵不倒松

——新加坡经济…………… 马燕冰(202)

在崎岖的道路上行进

——越南经济…………… 谷源洋(215)

恶梦何时了?

——印度尼西亚经济…………… 马汝俊(227)

退中有进,忧中有喜

——菲律宾经济…………… 丁传英(239)

从东亚金融危机看东亚经济模式

黄范章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导、前副院长，
中国亚太研究会副会长)

东亚经济的崛起，是战后以来世界经济中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之一。日本自 50 年代末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战略，于 60 年代开始经济起飞，获得成功；接着“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于 60 年代先后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坚决地从进口替代型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于 70 年代初也开始经济起飞，于 80 年代取得了 7%—8% GNP 年平均增长速度，成为举世公认的“新工业化经济体”（NIES）；东盟国家在“四小龙”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带领下，于 80 年代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中国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于 80 年代取得 9% 的年平均增长率，使国民生产总值在 7 年内翻了一番。正如世界银行 1990 年度报告中说，东亚经济已把它年增长速度从 70 年代的 6.6% 提高到 80 年代的 8.5%，使 80 年代成了“亚洲经济奇迹时期”。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进入 90 年代后的几年里，东亚经济不仅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而且在西方经济衰退（包括日本）中独显异彩（见第 21 页附表）。1993 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东亚奇迹”、“东亚模式”曾一时成了举世关注的热门话题。

然而，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阿尔文·杨教授等）对于“东亚奇迹”、“东亚模式”持怀疑、否定态度。他们说，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高投入而不是靠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这种增长不能“持久”，这种“奇迹”实是“纸老虎”。这种观点虽有见地，很重要，但未

免过于武断,因为任何工业化经济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都或早或迟要经历从“靠投入”促增长的粗放型阶段过渡到“靠技术”促增长的集约型阶段。东亚发展中经济不会也不可能长期停留在粗放型阶段。毋怪乎克鲁格曼教授等人的这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在国际社会,特别在东亚地区,既得到尊重,也遭到反对。

但对于东亚地区来说,更不幸的是1997年7月一声霹雳,金融风暴从泰国刮起,席卷东南亚,旋即北袭韩国、南袭台湾,虽然国际投机者亏损累累,但东亚经济却受到更严重打击甚至摧残。问题是:人们在分析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时,虽然认为国际投机者难辞其咎,但又不能不把分析的眼光引向东亚社会经济制度内部,毕竟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于是又有人据此认为“东亚模式”行将“崩溃”。究竟应如何认识东亚模式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东亚模式本身,无疑是东亚国家(地区)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性课题。

东亚模式,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经济起飞,比西方国家晚了近两百年,历史决定了东亚经济只能采取赶超型发展模式。关于研究东亚模式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但大多数人把东亚模式的特征主要归功于:“政府主导经济、高储蓄、外向型经济”等三大手段。我最近的研究提出,东亚“赶超型”经济还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夹生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加速经济发展和与外部世界接轨的又一重大手段。这些手段的运用,既帮助东亚经济在最近几十年内获得了高速增长,也使得东亚经济在其市场经济体系的培植、发展过程中,常易出现某些经济关系“不协调”或“扭曲”现象,而且金融领域中这些“不协调”或“扭曲”现象如不加以防范与控制,便可能成为金融风险的“风源”。^①

^① 关于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请参阅拙作《经济全球化、东亚模式、金融风险》,刊《金融研究》1998年第10期。

(一)

“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运用政府的力量来加速发展。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德国,虽已开始工业化,但比英法等国却晚了将近一百年,幼稚工业难以跟英法的工业竞争,著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理论便应运而生。他主张运用国家力量,在国内实现政治统一以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实行保护主义,藉此加快经济发展,迎头赶超英法。二次大战后的日本,为了重振经济,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并获得成功。其后韩国、新加坡、东南亚国家以及我国台湾省,都突出发挥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主要因为,发展市场经济虽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工业,但市场的自发力量将耗费更多的资源以及更长的时间,为了实现比发达国家更高的速度以达到“赶超”的目的,就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因此,政府的主导作用被视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因而也被视为东亚模式的特征之一。

研究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最有影响的是世界银行 1993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近年来出版的青木昌彦等人合著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也很有影响。后者把过去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分为两类:一是“国家推动发展论”,即把东亚经济的成功主要归因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了经济发展,克服了市场机制的失灵或缺陷;一是“亲善市场论”,即认为政府除了实施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外,决不干预市场机制的作用。青木昌彦等人提出新观点,即所谓“市场增进论”。他们声称,“市场增进论”跟前两种观点不同,并不把政府和市场仅仅视为互相排斥的替代物,而主张政府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职能,但又不是替代

民间部门。我的基本观点是,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作了许多描述与概括,但东亚国家和地区当初发展经济时并没有想到按什么模式运作,不应该由于东亚经济的成功把其政府的作用过于“理想化”了。然而有一点是公认的,即在东亚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确实起过而且仍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历来“赶超型”经济所共有的一大特色。

然而令人瞩目的是,在东亚经济的发展中,“政府干预”已不仅仅是“弥补”市场经济的“失灵”或“缺陷”,而是起了更加积极、有力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在推进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工业中,仅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将耗费更多的资源和更长时间,故有必要运用政府力量动员财政、金融的资源服务于产业政策,大力发展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如石化、汽车、造船和电子工业等),以实现比发达国家更高的速度;而且还因为在东亚这个世界新兴市场的建设中,全部基础设施以及许多制度工具(如银行、保险等)都须靠政府的力量或政府的支持去创建。国际社会为了显示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突出作用,遂把东亚经济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经济。

但也不能不看到,政府的作用(或“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也有负面影响,即它可能把某些经济关系(如利息率、汇率、股市等)弄“扭曲”了;倘若这种“扭曲”的程度过度或持续时间过长,就容易出现金融风险。其实,在经济发展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某些支柱产业、重点大企业而从财政、信贷上提供某些优惠,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而这些“优惠”政策也势必带来某些关系的“扭曲”或“不协调”(如利息率或税率过低);但不能“扭曲”过度或“扭曲”时间过长,否则,会严重损伤企业、银行、政府正常运转的机体,甚至会导致这三者之间产生某种灰色的乃至黑色的“融合”——“官商勾结”,萌发“腐化”的温床。这就给国内外投机者有隙可乘,酿成金融风险。

以韩国为例。韩国政府几十年来不仅动员财政力量而且动员

金融力量,组建大企业集团。在发展重化工工业的 70 年代,政府通过它所拥有的国家银行控制利息率,“指导”大部分贷款的分配,以低于均衡水平的利息率把大批贷款分配给重化工工业企业,特别是大型重化工工业集团。同时,政府还动员了国外信贷资金给大企业集团。按理说,为了加速重化工工业的发展,提供某些优惠贷款,虽带来经济关系(如利率、汇率等)的“扭曲”,但也可以加以控制。问题是:长期给少数大企业提供优惠资金的做法,势必会伴随产生大量“租金”和“寻租”行为,企业不惜耗费财力和人力来取得政府的优惠与照顾,官商勾结之类的腐败亦随之而生。况且,大量信贷被分配给经营实际并不成功的企业,造成银行呆帐剧增,迫使政府不得不通过货币扩张来救助企业和银行。大企业和银行的负债率都很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被严重“扭曲”了,一些大企业和银行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正如韩国财税研究所的赵润济先生所说:若不是政府于 1969—1970 年、1972 年、1977—1981 年、1984—1988 年多次对企业实行重大挽救措施,韩国早已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了。^①

迨至 90 年代,国内经济关系的“扭曲”进一步加深了,企业和银行都积债如山,韩国前 30 家大企业集团的自有资本比率仅占 18.2%,平均负债率高达 499%(1997 年破产的真露集团负债率最高为 8600%,三美集团为 3300%,汉拿集团为 2070%);而在全 1200 亿美元的外债中,有三分之二为银行的债务。企业和金融机构这样的资金结构,实难以抵挡重大的金融风波。加以韩国连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 1994 年 60 亿美元,到 1995 年 99 亿美元,1996 年的 205 亿美元和 1997 年的 237 亿美元),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外汇储备剧减。结果,1997 年 10 月韩元贬值和股市暴跌,外

^① 青木昌彦《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年出版,第 259 页。

汇储备在 12 月仅余 60 亿美元,而当年到期债务有 200 亿美元,形势危急,迫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机构求援。

(二)

“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是:经济“外向型”,即大力发展对外经济。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赶超”,需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即需要外国资金和技术,需要发展对外贸易,从事资本积累。令人瞩目的事实是,战后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赢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倒不是资源较丰富的那些发展中国家,而是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和地区,如“四小龙”。东亚地区其它国家也都致力于发展对外贸易和积极利用外部资金(国外贷款和直接投资)。据统计,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进出口)一般都占到 GNP 的 30%—40%,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它们特别倚重于出口,因为出口是它们获得国际收入的主要来源。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6),东亚各国和地区对出口的依存度相当高(见下表)。东亚各国和地区还努力引进国外资金,中国倚重于外国直接投资,近几年来一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引进国,而韩国则一向倚重于利用外债,至于东盟国家引用国外资金均达相当规模。值得注意的是 1994 年以来,东盟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停滞状态,但所借外债却增加很快,其偿债率除马来西亚外一般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左右,印尼的偿债率近几年来一直超过 30%。总之,东亚经济的起飞与发展,都是与它的对外经贸的发展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对外经贸的发展带动或推动起来的。

1996 年出口依存度

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尼	新加坡	韩国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39	90	34	25	177	36	24	139	38

1991—1996 年东盟四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债总额

(亿美元)

年份	印 尼		马来西亚		菲 律 宾		泰 国	
	外商直接 投资	外债	外商直接 投资	外债	外商直接 投资	外债	外商直接 投资	外债
1991	5.51	795.0	10.54	178.0	4.13	300.0	10.17	333.0
1992	17.77	880.0	39.98	200.0	2.28	309.0	20.14	374.0
1993	20.04	891.0	50.06	233.0	12.38	343.0	21.14	468.0
1994	21.09	965.0	43.42	225.0	15.91	371.0	13.22	550.0
1995	43.48	1078.0	41.32	274.0	14.78	378.0	20.03	681.0
1996	79.60	1202.0	53.00	287.0	14.08	383.0	24.26	785.0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97);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1997,1998).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东亚国家的对外经贸的发展,也使得东亚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制于外部环境,即不仅容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经济衰退、货币危机、股市涨落、汇率波动等)的严重影响,而且本国的经济问题或政策失误,也容易被国际投机者所利用。经

常看到的是这些国家的进出口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首先泰国就是由于出口下滑、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而触发了一场货币危机。至于外资利用方面,这次金融危机特别显示出了短期外资的不稳定性或很大的风险,韩国受累于短期外债和泰国受累于短期外资(游资),都是明证。发展外向型经济可能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不容忽视。

还须提及一点,外部环境对于外向型经济虽有重大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却依开放的程度为转移。对外开放应该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一般说,先贸易后投资,先实业后金融与服务业,先关税后非关税,先经常项目(指汇兑)后资本项目。前一段是后一段的准备,后一段是前一段发展的要求。如果急于求成,搞“不成熟的”开放(或“夹生的开放”),势必招致风险。例如,泰国在本国银行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经常项目连年逆差的情况下,过早地于1992年放开资本项目,却给国际短期游资和投机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三)

高储蓄率是东亚模式的另一个重大特点。一般说,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自然需要有更高的储蓄率,更高的投入,才能赢得更高的增长速度。但诚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克鲁格曼教授所说,东亚国家应该摒弃单纯靠增加投入来赢得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而应转向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不管哪种增长方式,一个共同的前提:增加储蓄,因为这是积累的源泉。东亚经济“奇迹”得益于三十多年来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保持着高达30%—40%的储蓄率,比许多发达国家高得多。

东亚地区的高储蓄率,不仅出于经济上“赶超”的需要,也得益于东亚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节俭。节俭、简朴一向是东方文化中一颗亮晶的瑰宝。在上千年的小农经济中,人们经常节俭,目的

是储粮备荒以及应付其它不测事件；而进入现代化社会后，人们才把储蓄与投资熔为一炉。日本是一个有着以尚节俭、高储蓄的优良传统闻名于世的国家。在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展起来的基层储蓄运动，培育了人们的经济习惯并且造就了稳定的小额储户（不是投机者），为日本成为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二次大战后，日本为了振兴战败国经济，由日本银行的总裁一万田先生倡导了一场名为“储蓄救国”的声势浩大的全民性的储蓄运动，确保日本 60 年代里赢得了高增长，提高了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并且使日本于 70 年代初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之一。

东亚地区尚节俭、重储蓄的传统，跟西方国家的“消费主义”、“福利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所反映的传统观念中，“节俭”、“储蓄”是美德，“奢侈”是“不道德”。迨至 30 年代出现了大危机，世界性的生产过剩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所关注的已不是物资“匮乏”而是“消费不足”。1936 年凯恩斯在其名著《通论》中提出了“有效需求论”，把“过渡储蓄”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说成是造成高失业的原因之一。凯恩斯在书中引用孟德维尔写的《蜜蜂的寓言》，来简明地表述他的这一基本观念，力图改变人们关于节俭和储蓄的传统观念。萨缪尔逊（P. Samuelson）在其有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用一小节专门讨论“节俭的是非论”，企图渲染节俭和储蓄带来经济凋蔽和失业，把过去的美德说成是“罪恶”。^① 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流行，导致“消费主义”、“福利主义”之滥觞，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使鄙薄节俭、追逐消费的观念、习惯、生活方式逐渐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东亚地区尚节俭、重储蓄的传统，跟西方文明的消费主义虽大相背悖，但也互有影响。虽然如此，但东亚的传统思想与生产方式

① 参阅《黄范章选集》，第 129—130 页，山西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东亚经济路在何方

确保了近几十年来这一地区的高储蓄率以及投资率,分别达到25%—30%和30%以上(见下表),而且东亚地区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在近几十年里还趋于增长。

1978—1993年东亚地区的储蓄率、投资率及增长率(未包括日本)

年 份		1978—1981	1982—1985	1986—1989	1990—1993
亚洲新工业经济体 (ANIES)	投资率	33.1	28.0	27.8	31.9
	储蓄率	28.1	29.1	35.9	33.7
	GDP 增长率	8.3	7.5	9.9	6.5
其 中	韩 国	投资率	29.1	31.0	36.7
		储蓄率	25.1	35.0	34.8
		GDP 增长率	8.9	10.5	7.0
	中 国 香 港	投资率	26.3	26.6	28.3
		储蓄率	27.4	32.6	31.7
		GDP 增长率	4.7	9.0	4.7
	新 加 坡	投资率	46.7	37.3	40.4
		储蓄率	43.9	42.0	48.3
		GDP 增长率	5.4	8.0	7.7
	中 国 台 湾	投资率	22.5	21.0	23.7
		储蓄率	32.9	37.4	29.5
		GDP 增长率	6.9	9.7	6.2
东盟国家 (4个) (ANIES4)	投资率	26.3	27.1	28.1	34.8
	储蓄率	24.6	23.0	26.6	29.8
	GDP 增长率	7.0	3.6	7.1	6.8